史海钩沉

山西大学在韩城办学始末

□ 陈玉振

抗战时期的大学内迁是一段特殊而珍贵的记忆。作为中国近代最早成立的四所国立大学之一，山西大学在民族危亡之际，为保存教育火种，曾西迁陕西韩城办学，这段历史与西南联大、浙江大学等西迁共同构成了中国抗战时期大学内迁的壮丽画卷，展现了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生生不息和高校与地方团结一心、艰苦奋斗的自强精神。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军迅速向华北腹地推进，同年8月初，日军袭击同蒲路北段及太原，山西形势骤然紧张。面对日寇的铁蹄，山西省政府紧急命令山西大学及省城各大专学校立即迁往晋南，以躲避战火，保存教育力量。这一决定开启了山西大学长达十二年的流亡办学历程。

山西大学自1902年创建以来，经历了从山西大学堂到国立山西大学的发展历程，到抗战前夕已发展成为一所包括文、法、理、工、教育五个学院，下设14个学系的综合大学。然而，战争的爆发打断了学校正常的发展轨迹。1937年11月，山西大学师生被迫离开太原，开始了艰苦的迁徙历程。他们先是迁至晋南的临汾，随着战局恶化，1938年春又继续西迁，先后辗转陕西三原、宜川秋林镇、山西吉县克难坡等地，最终于1945年12月迁至陕西韩城继续办学。在韩城的岁月虽短暂，却承载了山大师生在极端艰苦条件下坚持教学、“豪饮一路风雨，托起明日朝阳”的坚韧乐观精神，成为历史上秦晋之好的又一段令人动容的篇章。

随着抗战进入后期，山西局势依然动荡。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山西大学师生满怀希望准备返回太原复校，但由于国共内战的爆发，太原局势仍然不稳。1945年11月，山西大学决定暂时迁往陕西韩城，等待更合适的时机返回太原。选择韩城作为临时校址有多重考虑：首先，韩城位于黄河西岸，与山西隔河相望，地理位置相对安全；其次，韩城是历史文化名城，文教氛围浓厚；再次，韩城交通相对便利，便于师生生活和教学物资运输；再加上韩城距离之前办学的克难坡不远，迁徙相对容易。就这样，在抗战胜利后的这段特殊时期，山西大学开启了开赴陕西韩城办学的征程。

1945年12月，顶着黄河上凛冽的寒风，山西大学师生开始了从山西吉县克难坡向陕西韩城的迁徙。这次迁徙虽然距离不长，但在战后物资匮乏、交通不便的条件下，仍然是一次艰难的旅程。师生们需要携带教学设备、图书资料和个人物品，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这次迁徙是分批进行的。由于当时交通工具极为有限，大部分师生只能步行，仅有少量教学设备和珍贵图书能通过简易船只运输。黄河渡口处，师生们相互扶持，小心翼翼地踏过冰面或乘坐简陋的渡船。许多年后，亲历者回忆这段经历时仍感慨万千：“那时候过黄河，真是提着脑袋在走，但为了能继续读书教书，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韩城方面为迎接山西大学的到来做了必要准备。虽然条件简陋，但当地政府和文化教育界人士对这批来自山西的“文化难民”给予了热情接待。校部设在县城内相对完好的城隍庙内，各学院则根据专业特点分散安置：文学院、法学院等文科类学院多设在城内文化气息较浓的区域；工学院则靠近有简易实验条件的场所。这种分散布局虽然给教学管理带来不便，但在当时条件下已属最佳选择。城隍庙两旁较大的廊房成了师生宿舍，较大一点的做教室用。其余师生分别住在韩城县城北关及东中西、薛曲村等周边的一些公共建筑和民居中，教室、宿舍、办公室分散在多个地点，形成了战时大学特有的“分散办学”格局。

迁徙完成后，山西大学在韩城迅速恢复了基本教学秩序。没有固定的校园，教室便多设在临时腾出的民房、祠堂或公共建筑内。没有桌椅，学生们就用小板凳当椅子，用二尺见方的木板当课桌，上课时常常自带小板凳，或者干脆站着听讲。照明条件也十分有限，虽然比起之前在虎啸沟的油灯，韩城有了电灯，但电力供应极不稳定，学生们仍经常需要借助煤油灯或蜡烛学习。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山大师生仍坚持开展学术和文化活动，展现了山大师生在艰苦环境中的乐观精神。在这里，学生们除每天上课升旗外，还有组织地参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开纪传体之先河的司马迁有关的历史遗址，无不为历史学家的雄才大略感到自豪！

在韩城办学期间，山西大学的师资队伍保持了相对完整。校长徐士瑚带领一批知名教授坚持教学，确保了教学质量不因战争环境而下降。虽然战争导致生源大幅减少，但在韩城期间仍有新生陆续入学。据校史资料记载，1946年外文系招收新生7人，虽人数不多，但在当时环境下已属不易。这些学生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求学，展现了中华民族青年一代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尽管条件艰苦，山大在韩城期间仍保持了较为完整的课程体系。以外文系为例，一至四年级开设的课程包括：英文文法、散文选演及习作、小说选读、戏剧、英文诗歌、希腊神话、语言学、莎氏戏剧选读、英国文学史、欧洲文学史、伦理学、中国文学史、西洋史等，还提供俄语选修课，这些课程由朱启寰、杜文甫、阴幼斋、李贯英、史景苏、杜文若等教授讲授，保持了相当高的学术水准。此外，还有讲授伦理学的田润霖、讲授论理学的潘泽清、讲授中国文学史的郝树侯等，都是各自领域的知名学者。这些教授放弃了大城市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跟随学校辗转迁徙，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时刻的担当精神。

图书资料和实验设备是山西大学在韩城办学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在多次迁徙中，山西大学的图书损失严重，实验设备更是所剩无几。师生们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图书方面，他们互相传阅手头有限的教材和参考书，有些教授甚至凭记忆编写讲义；实验方面，理工科教学不得不以理论讲授为主，辅以简单的演示实验。这种“纸上谈兵”的教学方式虽然有很大局限，但在当时已属难能可贵。

战时的大学生活并非只有艰苦和单调。山西大学在韩城办学期间，学生们组织了各种社团和学术团体，如“文学研究会”等，开展读书会、诗歌朗诵、时事讨论等活动。1946年2月17日，山西大学史学会还在韩城司马迁祠堂举行“太史公座谈会”，参加者有杜任之等36人，大家会后合影留念。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校园生活，更培养了学生的组织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韩城距离延安较近，学生们能接触到一些延安出版的进步刊物，这对开阔学生视野、激发爱国热情产生了积极影响。

山西大学在韩城的办学实况，展现了中国大学在最艰难环境下的顽强生命力。窑洞里的读书声、煤油灯下的奋笔疾书、教授们沙哑却坚定的讲课声，共同构成了一幅感人至深的“战时高等教育图景”。这种在极端条件下坚持办学、传承文化的毅力，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象征。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全国各内迁高校陆续开始筹备返回原址。山西大学原本也计划尽快返回太原，但由于战后山西局势依然复杂，学校不得不暂留韩城。直到1946年初，随着形势相对稳定，复校工作才正式启动。与迁往韩城时类似，返回太原的迁徙也是分批进行的。1946年3月，第一批师生启程离开韩城，渡过黄河返回山西。直到1949年5月，随着太原战役结束，才在太原正式复课，从而结束了长达12年的流亡办学历史。

虽然在韩城办学的时间不长，但这段经历对山西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锤炼了师生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这种品质在战后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它强化了学校的凝聚力，共同的艰难经历使师生们对学校产生了更深厚的感情；再次，它丰富了学校的文化传统，战时形成的一些教学方法和学术风格在和平时期得到了延续与发展。

山西大学在韩城的办学岁月已经过去近八十年，亲历者大多已不在人世，但那段历史凝结的精神却历久弥新、韩城人民的深情厚谊仍历历在目。山西大学也十分重视校史研究和抗战办学历史的挖掘整理。学校档案馆保存了部分韩城办学时期的珍贵资料，包括课程表、师生名册、照片等，这些史料确保了韩城办学记忆的延续和精神的传承，也必将永远激励着后来的教育工作者和学子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民族复兴和文化传承贡献力量。

文史小百科

古代的退休制度

□ 卜庆萍

我国古代的退休制度仅限于官吏，常见的退休称谓有“致仕”“致事”“致政”等。《春秋公羊传》曰：“退而致仕。”古书还注释说：“致仕，还禄位于君。”即官吏退休，交还官职于君王。古代官吏的退休制度始建于周，形成于汉，发展于唐，完善于宋、元、明、清时期。

那么，古代官员多少高龄才能退休？《礼记·曲礼》说：“大夫七十而致事。”汉、唐、宋、元等朝代，基本实行官吏七十而致仕的规定，即官吏到了七十岁才可退休。但特殊情况也可以提前退休，如唐朝规定：“老病不堪厘务者，与致仕。”即若身染疾病或受伤者，虽未到退休年龄，也可以退休请俸。明朝亦有相关规定，老疾不能任事者，或软弱无效能者，可随时勒令退休。到了明清时期，官吏退休年龄稍微放低。古书载：“文武官六十以上者，皆听致仕。”也就是说，古代官员六十岁便可退休。

其实在古代，官吏提前退休较为简单。只要官吏提出申请，皇帝一般都会准许。明弘治四年，皇上诏曰：“自愿告退官员，不分年岁，俱令致仕。”事实上，古代官吏未到退休年龄，主动要求“告老还乡”者，主要有这三种情况：一是回避权力斗争，二是无心官场，三是体弱多病，难当重任。人们熟知的晋朝彭泽县令陶渊明，就是主动请辞“告老还乡”，恩准后归隐田园生活。再如，唐太宗时，对朝廷有大贡献者，可延缓退休年龄超过七十岁。开国元勋李靖因伤病缠身，六十四岁时即被恩准“告病还乡”。

古代官吏退休制度，还包含另一个重要问题，即退休后的待遇。

首先，是政治待遇。《礼记》载：卿大夫致仕称“国老”，一般官吏致仕称“庶老”。这些称谓，都是对老臣退休后的尊重。到了唐朝，对致仕官员还要举行特别的仪式，敲锣打鼓，欢送其退休归家。三品以上官员致仕，皇上恩准其在朝廷自由往来，可参与国家大事。明朝致仕官员，在礼仪上仍然受到尊重。在参加宴会、祭祀等活动中，仍享有原有职级的政治礼遇。

其次，是退休官员的经济待遇。汉代有规定，年俸禄两千石以上官员退休，可领取原俸禄的三分之一作为养老金。魏、晋时期的退休官吏，则委以“顾问”之类闲职供养起来。唐代五品官以上致仕者给半禄，功臣元勋经皇帝特批，退休后可保留全禄。比如名相房玄龄、宰相宋璟致仕时，皇上特批均赐全禄。六品以下官员退休，则赐给一定数量的田地养老。两宋时期，对退休官员安置给予优待。尤其是宋神宗之后，允许官吏带职退休。官员退休时皆晋升一级，退休后仍可加衔晋级，并参与朝政。到了明朝初期，又有新规定：三品以上官员按现职退休，四品以下任现职满三年且无大过者，可升一级致仕。明朝中叶，则改为业绩突出者，可升两级致仕。在退休金方面，明初曾规定致仕官食原俸，但很快就予以取消。后又规定，退休官员一般情况下不发放退休金，但也不会让其饿着。若家贫难以生存者，“有司月给米二石，修其身”。清朝，官员退休基本上延续明朝的退休制度。

三秦史话

永兴坊与小东门的那些事

□ 李连源

以前说起永兴坊并无多少人知晓，而说起小东门则家喻户晓。而今说起永兴坊，这里已被打造成陕西美食民俗风情体验地，汇聚了省内40余家非遗地方小吃，让“舌尖上的陕西”与市民更加亲近。

在唐朝，永兴坊是当时长安城108坊之一，也是太宗朝名相魏征的府邸所在。从唐长安城图可以看出，永兴坊在皇城景风门外，魏征每日上朝要走永兴坊西口，顺皇城东墙外北行，过延喜门左转，再过嘉福门、长乐门进入太极宫，才可以进入办公区域，想必也是够周折的。

据说某日唐太宗问宰相魏征说：“我作为一国之君，怎样才能明辨是非，不受蒙蔽呢？”魏征回答说：“作为国君，只听一面之词就会糊里糊涂，常常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只有广泛听取意见，采纳正确的主张，您才能不受欺骗，下边的情况您也就了解得一清二楚了。”成语“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就是从魏征劝太宗的话演变而来的。

时光荏苒，转瞬千年。当年的名相府邸，如今已是皇都美食聚集地，来自全省各个县市的非遗美食，带着浓郁的地方气息汇聚于此，牢牢抓住人们的味蕾，让人欲罢不能。在一个书香气息浓郁、茯茶之香袅袅的泾阳老茶馆，几杯老茶带来几许怀旧，于是又想到小东门的前世今生。

对于老西安来说，有一段不可忘记的历史。1926年4月，河南军阀刘镇华在吴佩孚、张作霖、阎锡山的支持下，率镇嵩军9万余人进攻陕西，企图消灭退守西北的国民军，开始对西安进行长达8个月的围攻。国民军将领杨虎城、李虎臣率全城军民坚守，后冯玉祥将军率军入陕，西安之围被解，时称“二虎守长安”。

这里有一个细节与小东门有关，即中山门开于1926年（南边门洞称东征门，北边称凯旋门）。据此地老人讲，为纪念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冯玉祥将军倡议下，1926年1月开始修建中山门，由于时值隆冬，天气恶劣，工程时开时停，进展缓慢，直到听到军阀刘镇华将兵发长安的消息后才草草完工。由于来敌从东面而来，故将小东门两个城洞、四扇木门做得异常牢固。

到了1936年12月，蒋介石为督战“剿共”亲自来到西安，下榻临潼华清池。西安学生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国民政府一致抗日，当时游行队伍步行去临潼觐见蒋介石就出自小东门。学生们在灞桥被张学良拦下并作出承诺：“一个星期之内，我一定用事实来回答你们……”几日后，就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981年，为还原这段历史，著名导演成荫专程来西安拍摄大型历史史诗影片《西安事变》，而国军的第一道关卡就设在这里。笔者有幸观看了整整两天的拍摄，至今记忆犹新。当游行队伍喊着口号来到小东门（凯旋门）时，城门关闭，用铁丝网、麻包组成的防线瞬间合拢，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城墙上从两侧向中间集中，枪口对着城下学生；下面一排士兵持枪与学生对峙，一排卧伏在麻包上，用机枪对着游行队伍……

电影描写的是1936年真实发生在西安的故事，但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到1942年河南难民西迁形成高潮，许多逃荒的河南人住到了小东门里两侧及永兴坊，这段历史在电视连续剧《叶落长安》中有细致描述。到了1959年，由于发生全国性粮食短缺，全国人民在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中都处于吃不饱的状态。此时，小东门和永兴坊东侧顺城巷一带也被称作“鬼市”，是西安著名的旧货交易、古玩市场。

光阴似箭，往事历历在目，但已物是人非。2004年顺城巷改造工程启动，一片承载了千年历史、后又被低洼棚户覆盖的棚户区，随着城市建设的步伐被永久拆除，永兴坊这个在人们记忆中消失了很久很久的名词逐渐在人们耳畔响起。随后，一组精细打造的明清仿古“坊、肆”建筑群映入世人眼帘，它带着老西安的气质和特有的文化气息让每个来此的游客都赞赏有加、恋恋不舍。在一个个的茶余饭后，笔者常常徜徉其间，抚摸着这里的一砖一瓦，尽可能地打开思绪穿越到1300年前，徜徉在历史长河中……

2014年12月30日，经过精心策划，以“西有回民街、东有永兴坊”的集美食、旅游、休闲、购物、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永兴坊关中民俗商业街区正式开业，在引起老西安感慨与回忆的同时，一批批带着游兴而来的游客来到这里，品尝着关中美食，寻找着儿时味道，倾听着关于这里的那些老故事。

（上接第1版）

（三）握手时刻：“最强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最有效的方法是和衷共济”

出席庆典的间隙，外国政要纷纷走上前来，同习近平主席握手寒暄。多是老朋友，有的不久前才见面，有的很快又要相聚。

从庆典结束后的当天下午开始，塞尔维亚、缅甸、古巴、委内瑞拉、斯洛伐克领导人，先后走进习近平主席下榻的酒店。

国旗有序更换，会见厅的大门开开合合。莫斯科的握手时刻，既有搬不走的邻居，也有“天涯若比邻”的遥远国度。

双边关系的每一步抉择，都在浩荡的时代大潮中、在世界格局的大框架下进行。摆在人们面前的，有两道必答题。

一道题：在甚嚣尘上的保护主义面前，要不要继续坚持选择经济全球化？

这是会见中绕不开的话题，不少政要有感而发。一天前，普京总统即直抒胸臆：“加征高关税违背常理，也不合法，只会反噬自身。”

中国和欧洲，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制和国际经贸秩序，重任在肩。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态坚定，“愿同中方共同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规则，维护世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辗转来到莫斯科，再一次见到习近平主席，他也再一次强调，“塞方愿与中方团结应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带来的挑战”。

“冲出迷雾走向光明，最强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最有效的方法是和衷共济。”习近平主席说。

历史是勇敢者创造的。中国一以贯之的“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立场，在历史的关头弥足珍贵。习近平主席明确表示，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维护经济全球化成果”。

见面时，外国政要们说起“一带一路”、三大全球倡议、新质生产力等概念。在贸易壁垒筑孤岛、技术霸权砌高墙的当下，中国机遇、中国担当，惠及的不仅仅是双边，也给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注入了新动能，奋力推动世界经济走出逆风逆水。

另一道题：在不断抬头的强权政治面前，如何正确对待二战后的国际秩序？

今天的世界，最根本的挑战是秩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的集中体现——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访问之际，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国际形势越是变乱交织，我们越要坚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

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历史不能退回到“强权即公理”的黑暗时代。共同的呼声，也是顺应发展大势的大道之行。

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会见缅甸领导人敏昂莱时，习近平主席强调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的时代价值，主张双方要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

在现实中淬炼勇气。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近年来饱受单边制裁、霸权欺凌之苦。分别会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时，习近平主席强调，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都是主权独立国家，不是谁家的“后院”。他重申中方坚定支持古巴、委内瑞拉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坚定支持两国人民反对外部干涉。

一湾海峡割不断血脉。台湾回归中国，这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的笔锋早已写清的山河归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应有之义。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表述掷地有声：

“无论台湾岛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外部势力如何捣乱，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

正义之声，如潮涌岸。“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始终支持中方立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方在莫斯科纷纷重申一贯立场。这是对公平正义的坚定捍卫。

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在旧账未竟又添新账的世界，是拱火递刀还是劝和促谈，是胁迫恫吓还是摈弃对立？中国说公道话、做公道事，走得稳、行得正。

乌克兰危机延宕令世界忧心。对于一切有利于和平的努力，中国都表示欢迎。“中方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认为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消除产生危机的根源。”习近平主席着眼的是问题的根和本。

对于中方的客观公正立场，普京总统高度赞赏，表示愿不设前提开启和谈，希望达成公正、持久的和平协议。

乱云飞渡中讲道义、勇担当，收获的是支持、信任，是“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我们坚信，世界各国人民都会选择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公平正义一边。”

（四）习近平主席的莫斯科时间：“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要展现更多责任担当”

又是一年白桦新绿、丁香盛放，“梨花开遍了天涯”。

俄罗斯之行，有两个时长，给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个是估算下来，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交流近10个小时。

一个是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停留3晚。放在近年的中国外交中，并不多见。

这两个时长，意味着什么？

置于单边与多边激烈博弈、维霸与反霸深度较量的国际形势下看，中俄全面战略协作的全球意义、历史意义熠熠生辉。

一致同意推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

一致同意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

一致同意推动政治解决各类热点问题；

……

中俄两国的广泛共识，是动荡形势下的战略对表，更是两个大国对世界的“特殊责任”“挺膺担当”。

“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要展现更多责任担当。”习近平主席的莫斯科时间，中国的大国角色是一条主线。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在历史的曲折发展中，也曾有过民族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灰暗时刻。然百年沧桑变。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成为这个伟大国度在新时代恪守的志向、笃定的行动。

从5月9日，望向9月3日。那一天，浓缩着一个古老民族的苦难与辉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

80年前，历史掀开新的一页。大国的浴火重生，从一开始就印刻着和平与正义。从当年率先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到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阔步向前的大国始终胸怀天下、济世为民。

鉴古知今。大国的角色，并非由一时一事所框定，而是在一次次的抉择与行动中得到诠释。大国的地位，并非单由实力的对比所定义，归根结底是由国际社会的人心向背所决定。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历史发展的关键当口，更多国家将目光看向中国。正如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所说：“中方的理念和行动增强了国际社会维护共同利益的勇气和信心。”

“在中国，看到了未来，看到了信心。”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今日中国的世界印象，是靠脚踏实地的奋斗赢得的。

信心，源于中国的发展力量。

就在访问前夕，俄罗斯媒体播出一部纪录片，普京总统在访谈中说：自25年前，他就注意到世界经济发展重心正向亚太地区转移；俄罗斯积极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为世界稳定打造坚实基础。

真正的历史自觉、历史主动，不仅在于预判一时的潮汐方向，更在于主动顺应历史大势、抓住历史机遇、引领历史发展。访问中，习近平主席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有决心和信心战胜各种风险挑战。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都将坚定办好自己的事。”

“坚定办好自己的事”，这是今天我们应对一切艰难险阻的底气所在，是我们引领国际社会以合作同渡风雨、共越关山的信心之源。

访问前夕，国际媒体对中国的两重观察，放在一起看可更清晰读懂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变迁。

第一重观察，聚焦中国发展，结论是“中国科技发展慢一拍”的时代已经过去，高质量发展的中国日益成为“引领性力量”。

另一重观察，聚焦中国的国际影响，结论是当前中国给世界带来的改变不仅仅是“事件史”，还是更深刻变革的预兆。

信心，源于中国的合作力量。

2013年，担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第一站，习近平主席就来到了俄罗斯。“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应运而生。

随着时间的延展，践行这一理念的合作框架日臻完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为建设美好世界汇聚更多共识与力量。

今天，再一次来到莫斯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之光，在世界的感召力影响力已令人惊叹。2021年秋、2022年春、2023年春，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三大全球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进一步丰富拓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照亮了人类文明的征途。

“将继续参与‘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工作”“双方将就全球安全倡议开展合作”“俄方高度重视全球文明倡议”……中国，在动荡的时代坚定不移“站在历史正确一边”，见者远、闻者彰。

启程前往莫斯科前夕，习近平主席同欧洲领导人互致贺电，庆祝中欧建交50周年，以合作应对时代挑战成为双方明确共识；

再往前，东南亚之行，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迈出坚实一步；

而将目光望向接下来的时间，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的消息，传遍了海内外。

时代的风浪起起伏伏，一以贯之求正和、讲合作、谋共赢的中国，坦坦荡荡，朋友遍天下。

“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发展前进。艰险和磨砺，无阻大道如砥、大势如潮。一个谋大势、担大义、行大道的负责任大国，前路无比壮阔。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